



红日照耀中国

主编 杨思懋

人民日报出版社

红日照耀中国

——中国共产党辉煌历程纪实

主 编 杨思懋

副主编 孙 菲

(卷四)

人民日报出版社

【执政史记 兴国方略】

☆☆☆ [中共五大]

○ 中共“五大”的历史地位

党的五大是在四·一二政变发生后才半个月这样一个非常状态下召开的。全党期待着这次大会能清醒地判断当前局势,回答人们最焦虑的如何从危难中挽救革命的问题。可是,这次大会没有能满足全党的期望。它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叛变,中国革命到了“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民主独裁制的阶段”,“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使革命“向非资本主义之发展方向进行”。这些在当时都是脱离实际的空谈。它把蒋介石的叛变看成整个民族资产阶级都已叛变,这种看法并不符合事实,在以后导致对资产阶级采取过左的行动。它又把汪精卫看成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把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政府看成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好像这是可靠的联盟,这就导致对汪精卫、对武汉政府采取右的迁就主义政策,并且对他们可能的背叛丧失警惕,不去作好相应的准备。大会提出“土地革命”的要求是正确的,但由于强调必须先取得“小资产阶级”的同意,实际是先取得汪精卫等的同意,又使这个主张成为一句无法实行的空话。对发展由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的问题,大会连谈也没有谈。在局势如此危迫、全党正期待着采取挽救革命的紧急措施时,谈论中国革命“向非资本主义发展方面进行”,更是空泛而不切实际的。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提出了批评,可是拿不出纠正这种错误的任何办法,并且仍然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因此,这次代表大会,没有能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为全党指明出路,提供坚强有力的领导,却徒然丧失时机,坐视整个局势继续恶化。

为了挽救中国革命的危机,共产国际在5月召开的第八次执行委员会全



体会议上,专门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后来又对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出两个紧急指示。在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中,有些意见是错误的,如认为四·一二政变表明中国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离开了革命统一战线,跑到反革命营垒去了,因而,错误地指出中国共产党当前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军阀的斗争与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之并进”。又如,5月间,汪精卫集团已表现明显的反动,但共产国际在同月所作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却错误地认为武汉政府主要的趋势“是城乡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革命联合”。再如,共产国际虽然认为当时武汉政府还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但又错误地认为“它已经走到工农专政的路上”。可是,共产国际有些意见在原则上还是正确的,例如:

关于农民土地问题,共产国际指出:“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会变成不可靠的将军们可怜的玩物。”同时,共产国际建议中国共产党立即动员千百万农民从下面直接实行土地革命,并努力使武汉政府积极赞助土地革命。

关于工农武装问题,共产国际建议中国共产党要“立即开始建立由革命工农组成的、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八个师或十个师”,还指出:“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入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充当指挥人员,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这个工作是困难的,但是没有别的办法。”

关于对武汉政府和武汉国民党的政策问题,共产国际特别提醒中国共产党要注意改造武汉政府的工作。针对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某些老领袖害怕革命,正在动摇和妥协中的情况,共产国际指出:“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这些新的工农领袖的大胆的呼声会使老头们坚定起来,或者使他们变成废物。”“国民党的上层必须加以革新,以土地革命中提拔起来的新领袖来补充它,必须靠工会和农民协会的千百万会员来扩大地方组织。”

关于惩办叛变分子问题,共产国际建议中国共产党要“组织以有声望的,不是共产党员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者唆使士兵残害人民、残害工农的军官。不能只是劝告,现在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

共产国际的上述指示,虽然其基本精神是正确的,但传到中国的时间过晚,而且缺乏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执行起来有相当困难。尽管如此,如果当



时中共中央按照共产国际的意见,千方百计地支持农民的土地要求,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建立和发展我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团结国民党左派,为挽救中国革命进行坚决的斗争,形势的发展总会好一些。然而当时为陈独秀右倾投降议者所把持的中共中央,却没有这样做。同样,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易和苏联顾问鲍罗廷也没有对共产国际这些指示采取积极态度,而是对汪精卫集团一味实行右倾投降主义的退让政策。这样,最后挽救革命失败的时机便又丧失了,以致危机日益严重,革命的失败终于不可避免。

党的“五大”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召开的。这次大会虽然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全党没有及时认识右倾投降主义的根源及其危害。大会虽然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本质有所认识,但对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汪精卫集团的反动本质没有认识,完全丧失了革命警惕,因此,大会不可能提出挽救时局的有力措施,也不可能担负起在革命的紧急关头,挽救革命的历史职责。

1. 陈独秀在大会上的报告是右倾投降主义的

陈独秀的报告,明显地表现出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其一,对形势和阶级力量对比的估量是错误的。他一贯对资产阶级力量估计得过高,对国民党的作用也看得过高。并且错误地把谭延闿、唐生智、孙科等地主买办军阀看成是小资产阶级。由于对这些人的让步,并接受他们的影响,所以,不但不去领导工农运动,反而和他们站在一起去指责工农运动“过火”。其二,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指出等北伐完成以后,农民运动扩大以后再进行是错误的主张。“五大”前后,随着农民运动的发展,土地问题成为革命的中心。但是,这时“党不但没有土地革命的决心,并且还有与国民党一起组织土地委员会来解决土地问题的幻想,不明白只有发动土地革命,才能引导革命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其三,在革命发展方面问题上,错误地主张革命力量应退出帝国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势力强大的上海、广州、汉口等南方各省市,而向西北发展。这种主张,实质上是放弃革命的逃跑主义,“无形之中引导我们转向总退却和回避土地革命的方面去,同时抛弃无产阶级坚决的正确领导态度,而附会与发展的了小资产阶级及国民党的犹疑与动摇”。

综上所述,陈独秀的报告在这些关系革命全局的问题上,没有给以正确的回答,反而提出错误主张,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2. 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后期指导上的失误

陈独秀在“五大”报告中的错误,与共产国际代表的指导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很多是鲍罗廷的观点。比如,陈独秀在报告中指出的革命向西北发展,就是



鲍罗廷的主张。这种主张被称为“西北学说”，它回避帝国主义，离开东南工业中心，到西北去建立革命根据地，停止土地革命，等打到北京后再说；取消所谓工农运动的“过火”；向小资产阶级让步；承认国民党的领导权，共产党在政治上完全处于从属地位，完全向汪精卫、唐生智投降，自动地退出国民党及其政府，以换取共同打到南京去。陈独秀不但接受鲍罗廷的主张，而且“忠实地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由此可见，陈独秀的错误，决不是他个人的事情，其中包括共产国际代表指导上的错误。可是，在后来的“八七”会议上，共产国际的代表却反对有些同志说，中国党的错误国际方面应负责任的意见，认为责任应由政治局大家来负。这显然是不公正的。

还应指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虽然是正确的，但是，这个议决案是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以前作出的。四·一二政变以后，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革命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决议案关于中国问题的指示，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在“五大”召开的同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对中国问题又作了新的决议案，进一步提出解决中国革命危机的四点具体措施，其要点是：(1)实行土地革命，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2)吸收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以改造国民党中央机关；(3)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和五万工农群众，组织自己可靠的军队；(4)组织革命军事法庭，惩罚与蒋介石有关的坏蛋。这个指示传达到中国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相信国民党和汪精卫超过了相信共产党，不把这一重要指示向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传达，而是将副本交给已经作好叛变革命准备的汪精卫，成为汪精卫叛变的一个“借口”。罗易这个行动，加速汪精卫策划分共和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导致了大革命的迅速失败。

3. 大会没有能够纠正陈独秀错误的主要教训

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能够在中央领导机关占了统治地位，这是和党的幼年时期缺乏经验是分不开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因此，党的领导机关中占统治地位的成分，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在这一阶段的紧要关头中，没有能够领导全党巩固革命的胜利，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而使革命遭到失败。”

大革命失败的严酷现实,深刻地教育了中国共产党,逐步认识到:要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坚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放手发动农民,反帝反封建,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保持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革命领导权,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和一切革命阶级或阶层建立和发展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必须充分认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建立和发展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武装,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要取得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大力加强自己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不断提高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抵制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影响;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及时纠正党内出现的机会主义倾向,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不断健康发展起来。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善于总结成功的经验,也十分重视失败的教训,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纠正错误、不断前进的重要原因之一。

○ 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

1. 从上次本党大会以来,革命发展得很快,党的长大也同样的快。从第四次全国大会到现在,党员自 900 余人增至 5 万余。党的政治影响比数量的增加更快。本党无疑的成为全国工农的领袖;领导无产阶级经过两年的不断的斗争,斗争中包含好几次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武装暴动。在党的领导之下,4 年短期之内,280 余万工人与 900 余万农民,已经组织起来。本党已成为群众的党了。

自“五卅”起,上海无产阶级的斗争、香港罢工、汉口无产阶级的反帝国主义斗争……都是中国革命史中重要的事件。在过去的 2 年,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站在最主要的地位上。如今他已取得斗争的领导权。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这样的地位,足以保证革命的前途,将来不会开出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而是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

2. 中国革命的发展,已符合第七次国际扩大会议决议案所指出的道路。民族革命之发展加紧了阶级斗争。国民党内的封建分子及资产阶级,想领导革命,以与本国反动派及外国帝国主义妥协;然而包含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左派,则反对封建分子、资产阶级的妥协政策;于是在民族解放运动之中,发现了危机。封建分子、资产阶级看见不能依了他们的阶级利益而领导革命,他们就把国民党分裂了。他们不但离开了国民革命的斗争,并且转而反对之。他们已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上海无产阶级,做了两次英勇的暴动以



欢迎革命军,他们在反抗北方反动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有很大的牺牲。但是,南军占领上海后,不久蒋介石就在上海下命令屠杀工人。

现在革命已进到第三个阶段,封建分子与大资产阶级已转来反对革命。在这阶段中,革命势力之社会基础是无产阶级、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联盟。在这革命的联盟之中,无产阶级将实行其领导权。

3. 革命运动发展,无产阶级势力增加,同时,反革命的势力也渐渐形成。反革命势力的形成,有下列的表演:(A)帝国主义列强之联合的直接武力干涉;(B)反动军阀与大资产阶级同盟反对国民革命。帝国主义者看到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民主政权,足以给帝国主义者及其同盟军以最后的打击,他们便想用武力恐吓手段强逼革命的国民政府采用妥协政策,另一方面,他们帮助并鼓励军阀与大资产阶级建立反革命的同盟。革命运动中第三阶段之初期,就遇到了帝国主义军阀与大资产阶级联盟的这种威吓。但是,革命运动正要在坚决反抗这反革命联盟的斗争中,更加向前进展。革命势力定能巩固集合民族的精神,巩固一切革命力量,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独裁政权,以反抗并破坏反革命的同盟。

4. 从“五卅”起,无产阶级开始为反帝国主义斗争的领导权而斗争。这个斗争建立了广州革命的国民政府,获得暂时的成功。封建的及资产阶级的分子,看见这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将走得太远,客观上危害了他们的阶级利益,于是他们也开始用全力使民族解放运动移转到他们的指挥之下。当时我们的党,却只注意于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互争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第一个表现就是3月20日的事变,蒋介石推翻了左派政府。

3月20日事变,开了争夺领导权的第二阶段。在此时期,资产阶级占了上风。他们利用他们在广东的胜利,而想把他们的权力扩大至于全国。在这时间本党没有正确的政策。固然,资产阶级一天留在民族革命运动中,我们就一天须与他们结合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但是资产阶级将来的作用,在3月20日之后,已经更加清楚了。然而本党没有懂得资产阶级已经重新得到民族革命的领导,并想消灭革命。因为本党对于大资产阶级在此后革命阶段中的作用,没有很清楚的认识,所以在讲联合战线时,没有致力于给劳苦群众的利益以足够的保障。这并不是说我们在3月20日以后的反动时期中,要立刻倒蒋。本党的任务是继续地去争领导权,——建立一个左派的革命联盟,包含工、农、小资产阶级,以反对封建分子及资产阶级的领导,这封建分子、资产阶级的领导,客观上是必将出卖革命。这个任务并不与联合战线不两立。





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必须在农民中得到同盟者。无产阶级要提出急进的土地改良之要求,以巩固与农民之团结,向封建分子、资产阶级之反动奋斗。本党没有实行这个任务以领导无产阶级。联合战线做得太广泛了。甚至乡村中的封建宗法的反动分子也联合在内。在本党领导之下的广东农民运动,除要求组织农民协会与减租外,没有更急进的要求。当时封建分子和资产阶级的联盟已经准备使革命妥协,至于消灭,而本党没有认明;应当在乡村之中攻打他们的根基。实则只有进攻这种封建分子、资产阶级之反革命,才可使革命的社会基础更加深入。这件事没有做,为了这个原故,广东便很容易地失掉了。

5. 北伐之主观上的动机,是资产阶级想扩大他的权力。但是客观上北伐是发展革命的方法,所以帮助北伐的政策是对的。但在此革命地盘扩大之时,本党未能充分注意使革命的社会基础同时深入之必要。这种疏忽,其根本原因,是因为过分估量了大资产阶级的作用。那时的策略,是先帮助资产阶级完成其革命的第一阶段(扩大),然后再来做第二阶段的深入。因为有这错误政策,所以不能征调全国革命的民权派的力量,以限制封建分子、资产阶级想利用军事胜利之帮助,而加强其势力之企图。最后封建及资产阶级分子的势力已经很强大,于是他们公开宣告包办整个的民族解放运动,而实行其分裂革命之政策。因为对于联合战线的见解错误,所以在革命军所占据的地域中,一切反动的社会基础,仍任其存在。因此,到蒋介石叛党的时候,不能使他孤立,封建的资产阶级分子,居然带着很大的力量,从民族革命中分裂出去。倘能及早在城市与乡村中(特别是乡村中)加紧阶级斗争,那末,早就可以摇动反动势力的地位,——例如广东之失,也就不会这样容易的了。

6. 对大资产阶级估量不确,甚至过分,于是对小资产阶级的估量就过小。小资产阶级不会成为一个独立政治力量的,当大资产阶级与封建反动势力联合而预备使革命势力妥协之时,无产阶级应非常注意小资产阶级,否则,他将与资产阶级一路走。上海暴动之失败,最大原因是无产阶级没有得到小资产阶级群众的赞助。

蒋介石并不是在4月12日突然变成反革命,而命令在上海的街道上屠杀工人的。从2月20日起,他已经是革命的仇敌了。但党没有指出蒋介石所代表的是资产阶级,他要消灭革命,因此,也就未能充分号召城市中民权派的群众,使他们围绕在无产阶级的周围,以防止蒋介石能够在上海建立其新军阀的独裁。

7. 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以为上海无产阶级的二月暴动是太早熟了,在那时



候的革命热情中,党不能有计划地指挥群众,建立苏维埃式的市民政府的尝试。更是太早熟了。大资产阶级一开始时便没有帮助这个运动;白色恐怖起来,小资产阶级也吓退了;于是无产阶级陷于孤立。二月暴动失败后至三月暴动之间的时期,是很可以利用之以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群众的亲密联盟,以为革命的民权政府的基础。但是因为第一次早熟运动的失败,使党跳到另一个极端;因此,过于重视资产阶级,拉他进市民政府,而忽视小资产阶级的群众。本党的另一错误,是于不自觉之中把上海运动做成是一种独立的,而未顾及全国民族运动的联系。

8. 第五次大会认识上海无产阶级在本党领导之下英勇斗争的历史意义。大会认为:虽然上海事件有许多失败与错误,但不失为无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之斗争中的重大事件。在这时期中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民权联盟,已经成为革命的唯一的社会基础。上海无产阶级仍为革命的柱石,上海仍是斗争的重要中心之一。上海无产阶级从“五卅”以来就继续不断的在本党领导之下做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且他的斗争必能坚决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统治并且反对资产阶级的妥协,将来一定是打倒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

9. 第五次大会坚决的认为:封建分子、资产阶级的叛离,不足以削弱革命。现在的时期不是革命低落的时期,而是紧张剧烈的革命斗争时期。在这时期里无产阶级成为斗争的原动力,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当封建分子及资产阶级留在民族运动中的时候,他们阻碍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政纲的实现,因此,群众的革命力量是被遏制的。现在革命的民权派力量之自由发展的障碍已经减轻,所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的运动可以加强起来。

革命基础之地域,需要很快地扩张,但是同时在这地域之中要把革命的社会基础使之深入。广东之失去,表现出革命只扩大而不深入的危险。这个时期里革命的主要任务,是除去反动根基,以巩固革命。要做这件事,必需执行急进的土地改良政纲和创造乡村的革命民主政权。

10. 革命势力的发展使帝国主义的干涉更加严重。于是小资产阶级之中发生一种恐惧失败的情绪,想要将革命根据地 from 帝国主义威胁之地,转移到别的地方。第五次大会警告全党:应当反对这种无根据的失败主义的趋向。帝国主义的干涉,确实存在。中国共产党应当领导工农群众从坚决的斗争中,保护革命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要巩固革命于中国的中部及南部,并不是忽视扩大革命地域之可能与必要。但中国共产党必定反对以扩大革命地域为借口,而实际上抛弃或削弱视时革命根据地的倾向。



第五次大会认为共产党应当竭力执行深入革命的职任,以巩固革命的根据地。如果认为要先完成北伐而后始执行急进的土地改良与民主政权之创造,那么,这正可以使资产阶级在他所占领的沿海诸省,戴着民族主义者的假面具而在极短时期内巩固他们的势力,以帮助帝国主义。东南诸省是经济上最行进最富饶的地方,我们不能拱手让给资产阶级。否则,这就是使帝国主义更加强固(因为中国资产阶级太弱,不能独立的生存)。如果这样,中国将要走进一个时期,在帝国主义财政资本的领导权之下,发展经济,使世界资本主义有很大的稳定。中国将继续处于帝国主义统治之下,虽然统治方式上或者略有改变,然而实质上这就等于消灭革命。

第五次大会认为共产党必须领导劳苦群众反对封建、资产阶级等的反动派,以巩固革命的胜利。革命的根据地一定要在那种省份里巩固起来,那边要有久经战斗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农民组织,以及高度发展的国民党及共产党的组织。共产党不能想出一个更天然可靠的基础,如上海无产阶级、广东工人阶级,广东、江西、湖南、湖北的革命农民。第五次大会丝毫不减少扩大革命地盘与打倒张作霖的需要,同时也以为党有一个目前重要的任务,就是在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诸省,毫不留情的与反动势力作战。这个任务的完成,其意义是在很大的地域上建立革命的民主政权,这地域在社会情形及经济上都是合宜的。这样可以铲除封建资产阶级消灭革命的企图。客观上的条件(国内的与国际的),都利于中国革命发展到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民主独裁制的阶段。这个革命前途不仅是国际决议案所指示的,而且是由事实所产生的。如果对于这种前途有分歧的政策,那就是把革命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其意义就是消灭革命。

11. 四年前中国共产党在两种条件之下,加入中国国民党,(A)保持组织的独立;(B)有批评的自由,以执行其拥护工人阶级利益之政治的主张。在此合作中,本党曾很坚决地反对右派,因右派系主张限制本党的独立组织者。但是本党在国民党内,以前只有离开国民党而求所谓的“独立”政策,而实际上并未能将真正独立的工人阶级之政策执行下来。主要的原因,就是本党对于国民党的阶级基础未能正确的认识。在现时这一革命的阶段之中,工人阶级的利益与影响,应在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政治上很明显地很坚决地表现出来。

革命的现时阶段之中,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比以前应当更加密切。资产阶级之退出,使国民党日益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三种被压迫阶级的联盟,无产阶级是这个联盟的原动力。在这种情形之下,共产党不仅与国民党共同担负责任,而且共同担负政权。共产党一定要使一切革命政策、政纲与策略之





决定中,都考虑到工农的利益。共产党不能做国民党的旁观者或反对者。这革命的联盟,必定要立在一个共同的国民革命的政纲上。

共产党的加入国民政策与省政府,以及由联席会议讨论革命的实际问题之新方法,都已表现国共两党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在这新的情况之下,党团工作变成非常重要。要经过党团使政权与党的机关影响群众。第五次大会警告全党:决不可以因为我们与国民党关系的新方式而发生取消派的倾向。要知道一个革命的联盟并不就等于一个党。

现在阶段之中,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土地问题的急进的解决。这土地问题的急进的解决(土地革命),是巩固工农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所必需的;工人阶级领导着这个革命。第五次大会不赞成“共产党是工党,国民党是农党”的机械理论。土地革命就是推翻封建宗法的革命;这种革命当然要当代最革命的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是现在中国最革命的阶级,他应当领导农民去实行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

12. 现时的革命阶段的主要特质,就是无产阶级应当在斗争之中取得领导权。然而必须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有了保证,他才能完全实现这个政治上的功用而行使其革命的领导权。须有英勇的革命斗争,才能获得光明的政治发展。工资低微,营养恶劣,衣服褴褛受尽剥削的工人,决不能负担这个责任;所以要领导工人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第一条件,就是共产党要很坚决的为提高工人生活程度而奋斗。第五次大会认为:为实现工人在革命中的领导权起见,应当为工人力争下列的要求之实行:(一)八小时工作;(二)足够供给生活的工资;(三)劳动保护法;(四)救济失业,并为失业者觅得工作;(五)劳动保险及恤老金;(六)保护女工与童工。

13. 现时大资产阶级对于国民政府仇视,组织一个很显著的反革命大联盟,会同着帝国主义的干涉及经济封锁,来威吓国民政府,于是国民政府在财政方面感觉很大的困难。如果财政困难不能解决,那么,革命的斗争便不能继续进行,军队便不能改造,将要发展而成民权独裁制的政府机关,也不能建设。共产党应坚决地反对增加劳苦群众经济负担的企图,因为这不是解决财政困难的方法,而恰巧相反,这种企图却会削弱国民政府的基础。第五次大会认为:对于财政困难唯一的稳当的解决方法,便是农民革命。因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则向来交付给地主的地租,便可以有一部分到地税的形式交给国家,使国家增加了一大批财富。现在暂时解决财政的方法还有两点:A. 征收很重的财产税;B. 发行革命战争的公债,而把公债的担负加于不劳而获的阶级身上(资产阶级和地主)。

14. 在革命运动发展中,中国的青年们有很大的作用。在各种斗争中,青年在共产主义青年团指导之下,总是站在前线上,而给党以很大的帮助。在现在时期中,当革命运动要深入和扩大之时,青年的革命意义格外增加了。党对于青年之革命的意义须加以严重的注意。从前党对于青年运动,未尝加以充分的注意。将来党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必须建立一种亲密的联合,必须积极地领导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且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帮助。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主要的一部分,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一条运河,党须经过这条运河,而影响到广大的劳苦青年群众。我们现在如果把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数量上的增加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应负的任务比较起来,就可以看见现时共产主义青年团上的发展是很不够的;这是因为以前在各种斗争中,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群众工作太薄弱,或者共产主义青年团不能在他的组织下面巩固他的政治影响。共产主义青年团将来的工作,一定要很注意于群众运动的发展,要利用一切的机会,在工人之中以及乡村和军队之中去发展青年的群众运动。党盼望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第四次大会能根据这个精神去进行他的工作。

15. 党对于被剥削的妇女群众的工作,必须较之从前更加注意的去做。在工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之中,被剥削的妇女们,一定无疑的是很重要的因子。妇女是人民中最受压迫的一部分,她们在革命队伍之中,也是最为热心于革命的。

16. 去年的经验,已经证明了一切无党的普通群众组织,特别是济难会,在革命战线上,对于革命群众,已经起了很大的作用。党以后对于这些组织也必须加以重大的注意,为的是经过这些组织,而在工农和知识分子之中扩大和巩固党的影响。

(按《六大以前》刊印)

○ 组织问题议决案

本党最近一年半以来,已变成了真正群众的党,有5万人以上的党员。革命运动的发展,使本党有更加发达的增大的可能性。革命之深入,在本党面前提出了迫切的任务,即领导无产阶级、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并建立这些阶级的民主独裁制政权。

为要完尽这种任务,本党不仅应该变成群众的党,而且应该变成布尔塞维克的党,在思想上如此,在组织的原则和实际上也是如此。





然而,本党迅速的发展,党的干部人才缺乏而幼稚,我们的党部自然没有完备的组织和巩固之可能。在这里隐藏着很大的危险。

第五次大会认定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组织问题之指示是完全正确的,特训令新的中央须将党的一切组织工作,建立在共产国际此种指示之上,并须特别注意底下几点:

(1)努力扩大党的数量,并吸收产业工人、进步农民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到党的队伍中来,同时党应该尽可能迅速实行党的教育,训练新党员,用通俗的书报方法和实际党的工作方法。全党的积极工作,乃是党正确的发展和增长之最好之方法。

(2)中央应该尽力使党的基础建立在产业支部上面,并使所有大工厂、铁路、码头等都有我们的以支部为基础的组织,积极在广大工人群众中做政治工作,这才是真正领导工人群众。

(3)中央应该强毅地实行集体的领导,从中央、省委以至支部。党内纪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视政治纪律,不应将党的纪律在日常生活中机械的应用。要解决上述二种任务,其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吸引工人所有党部的指导机关来。

(4)在党面前,将来又有一个问题,即集中各方面的指导,在工会、在农会、在国民党及其他团体。为着这个,必须明显组织党团,严密服从党的指导。

(5)党应该严重注意在党外劳动群众的工作,在他们中发生影响,并指导他们。这些任务,经过济难会运动、妇女协会运动、学生会运动及革命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团体运动,是能够做到的。吸收劳动群众到国民党来,乃是本党解决这些任务之一方法。

根据本党自第四次大会以来党员数量激增这一事实并根据本党目前的任务,第五次大会认定必须改正并补充旧时党章。

(按 1927 年孙中山中国劳动大学编《五大决议汇集》刊印)

○ 土地问题议决案

1. 土地问题意义

(1)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大半尚建筑在封建的关系之上。大部分的田地(约 60%)为收租的大地主所占有。佃农及半佃农耕种田地,而没有享有田地的权利。田租的方式既不确定,租佃权也不能永久享有。田租大抵要占农民





全部收入的50%，除此而外，农民对于地主阶级以及握有政治的军阀统治者，还要交纳种种苛捐杂税。

中国田地只有34%属于农民。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的农业，固然除北方各省如山东、满洲外，几乎无有。然寺庙、祠堂等所属之地，占有耕地之数目，亦实有可观。井田之制，久已消灭，惟所谓公有田产之管理制度尚遗留于乡村间，作为乡村中宗法社会政权之基础。此等田地的主有权，已为乡绅所篡夺，耕田者反而失却享有的权利，乡绅等得变为地主，更利用此种权利，以行使其宗法社会的威权及统治。

军阀的统治，就建筑在这种土地关系之上，因为地主阶级的权力，实使封建宗法制度，在中国农村之中，仍旧保持其为经济政治组织及行使制度之重要特质。

(2)同时，初期的资本主义式的剥削，亦已深入于农村经济之中。所以中国农民实在同时受两种剥削：一是资本主义以前的（即封建制度式的）剥削，一是资本主义式的剥削。其结果，中国农民日就穷困，国民经济制度特别落后。

地主阶级所提取的田租特别的高，致使耕者反无剩余的收获。他们所得的，不能供给日常的需要。此种形式，即资本主义前期的剥削。在此剥削下，不许农民改善其生产方法，结果中国农业依然保护其原始状态。实际上就等于奴隶制度。农民只为消费而生产，其剩余都为地主所占有。

资本主义式的剥削，也在这种封建式的关系上建立起来，地主所收的佃租多属谷类（这又是封建制度的遗留），农产品的剩余，多归他们手里。但是地主得因此而变成商业资本家。不过他们的原始的封建性阻碍那充分的资本主义化的趋向。他们以原始式的剥削手段而积聚起来的财产，并未变成生产的资本，仍用到购置田地及重利盘剥等的投机事业。

经济的落后，阻止了新式交通工具的建设。同时全国经济形成了破碎不连的现象，将全国区分为多数孤立的商场，此等商场即为掠夺剩余农产品的地主所操纵。在此情形下，地主阶级便能强行抬高物价；如此不仅剥削农民，而且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亦在被掠夺之列。工资极低的无产阶级，却要出高价换得食物；就是小商人，也变成了地主阶级垄断的投机事业之牺牲品。

重利盘剥制度，即在此复杂的原始的剥削形式之下，很快地发展起来。此是唯一的交易制度，唯一的资本主义式的积累方法。然而重利盘剥者的资本，并不能促进商业或产业，依然用到土地投机事业上去。残酷的田租征收以及其他封建式的压逼，重利盘剥等的资本主义式的剥削，再加上军阀机关的榨





取,致使农民陷于永久的饥饿之中。

军阀在多数省份中占据着最高的政权,其统治机关在种种不同的方式下,剥削一般农民,以下即为其中最厉害的:

- A 正税与苛税(预征钱粮)
- B 军事给养(米粮、靴鞋、马匹等)
- C 战时苛酷的征收
- D 拉夫(运输军用品)
- E 滥发无价值的纸币(军用票)
- F 厘金征收

(3)帝国主义的统治,阻止中国经济的进展;于是中国产业特别落后,形成农村人口的过剩;而农村人口过剩的现象,实足以延长军阀封建式的剥削制度之生存。可见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农民问题有极密切的联系。

帝国主义因欲为其本国的产业找到贱价的原料,为其商品找到市场,于是力求殖民地的扩张。劳动力是最可宝贵的材料,殖民地半殖民充满了贱价的劳动后备军,当然是帝国主义国家中之产业的凭借。结果帝国主义的统治造成了殖民地产业的落后,而殖民地永久停滞于原始农业生产的状态。因此新式产业的发展,农村中的劳动力,不能充分向城市中转移。这样的退步现象,造成农村居民过剩,维持了封建经济的生命;否则,新式生产的发展,早将他们打破了。

帝国主义所引起的农村人口的过剩,延长了封建制度及其剥削。破产农民继续不断的增加军队的数量,致使劳动者的工资,落到最低限度,帝国主义的根基,因之更形巩固。综起这许多原因,造成了农民中极端的贫困与荒芜。失业的农民,既无处施用其生产的劳动力,于是变成为土匪与雇佣的兵士。中国的军阀,确是一个奇特的社会征象,其形成在乎国家经济的不完整不统一。军阀是封建势力剧烈的表现,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这种军阀会同买办及地主乡绅重利盘剥者,组成一个极大的机器,混合封建反动式的剥削与初期资本主义式的剥削于一炉而冶之,炼成压榨农民的铁钢。这一个机器吮吸了农民的血汗,破坏国家的经济组织。在此背景上,帝国主义进行其最完备的资本主义的掠夺。

经济的破产,驱使农民于重利盘剥者的铁腕中,利率渐渐增高,致使农民永不能脱离债务的负担,以致出卖或抵押其土地,土地遂集中于高利盘剥者之手。再则帝国主义者买办及土豪等还要借此以垄断原料,如预先放债给农民,使他们不得不以贱价将原料抵债等;这亦是对于农民的一种很苛酷的剥削。





同时,帝国主义者,如基督教教会及农业公司,还有直接以贱价勒买田地的;这种剥削方式便更加是帝国主义殖民地政策的表演。

(4)中国的军阀吮吸全国的膏髓,外国帝国主义阻碍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他们两者的根据地都是农村中的封建组织。所以中国民众欲达到打倒军阀及帝国主义的目的,基本的条件就是肃清农村中封建势力的残余及宗法社会式的政权。急剧地变更土地所有制度,是国民革命中唯一的原则,非然者,为真正民权的自由战争,将停滞而不能前进;欲消除上层的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组织,必须破坏他的根基。

(5)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没有他们自动地自觉地来参加,国民革命是决不会成功的。农民的精神,必能贡献于国民革命,如果农民的剥削机关能彻底解除。农民革命——打破封建制度——是建立民权制度的革命所不能离的。在通常社会的发展中,资产阶级能为农民破除封建的锁链。但是此种通常的社会进化,在中国已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所扰乱。中国的资产阶级并未形成一个反封建势力的成分。在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因为是从地主阶级产生出来的,依然同地主阶级保持亲密的结合,甚而至于变成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民众的工具(如买办);在这两个情形之下,中国的资产阶级与剥削农民的势力有密切的联系。所以他不能做农民革命的战士。中国资产阶级仇视农民革命,他不但不能为民权自由而奋斗,反而做民权自由的敌人(蒋介石的分离革命即其一例)。

农民将要受无产阶级的赞助(并有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为助手),而从事于历史的战争,消灭封建势力及其党羽。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客观上系反对帝国主义垄断中国经济的;帝国主义的垄断,是保持乡村中封建关系的主要原因。但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关系亲密;虽与他们阶级有利,他们也不能完成土地革命以促进反帝国主义的斗争。

(6)资本主义前期的封建式的剥削之影响于经济者,为食料价格的增高,商业的停滞。此两种影响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所共同感觉到的。所以这两个阶级都是反对剥削农民的,农村的急剧改革,使耕者有其田,不但农民本身获得利益,全部人民都蒙其益。农民群众生活程度的提高,商业因之而大发展。设若耕者能享用其自己生产的剩余,债主的铁腕将失掉其作用,农民可用由农产得来的资本,从事于改良耕种的方法及工具。结果全国农业产额必为发生自由的市场,可使物价降低。最终,因封建式佃租的取消,国家税收可以得到新的源泉。

